抗日战争片断回忆

胡为新

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了，然而，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的斗争事迹，却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38 年我参加了抗日救亡团

1938 年秋，经过杨效先同学介绍，我在本村参加了抗日救亡团。 1939 年 5 月，我又由杨效先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入党也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监誓人是当时中共益都八区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入党后，党组织就宣布我为区委青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科长，不久又任命我为区委宣传科长。

我入党后，在我们大袁家庄只有我和杨效先两个共产党的干部。不久，我又发展了崔传禹入党。这样，我们村就成了当时益都八区党的活动的基点村之一，我的家也就成为当时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点。我曾在家里接待过当时益寿县委组织部长陈凤九同志和益都九区组织科长刘奉五同志。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常常住在我家，我经常配合他，到周围有地下党组织的村庄去活动或开会。我曾经联络过的人有二府庄子王美琛、张家小庄张桂一、薛家庙子王瞎子（外号）（抗日战争开始时从济南国民党监狱放出来的老共产党员），还有李家集李信古、黄家庄的黄盈等人。有时，我同林芳圃同志一起出去活动，有时，我一个人单独出去活动。我入党的事当时是绝对保密的，我的父母、大哥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村里的乡亲们虽不公

开说，但是都认为我天天接触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暗八路。

我参加抗日救亡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敌人的电话线。那是在 1938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村的青年刘福禄两人，手持一把老虎钳子和一把锯子，到村西三里地外的李家集村北面，那里是益都县到寿光县的一条大公路。我们沿着公路，将一根根电线杆拦腰锯开，把电线杆推倒，再将电线剪断，把电线卷起来。从南向北，我们锯断了十几根电线杆。然后，每人背了一大卷电线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不停地琢磨，电线背回来放在那里？自然不敢放在自己家里，唯恐被人发现。最后我急中生智，把这些电线全部丢进我家菜园子的水井里了。就这样我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抗日任务。

在胶济铁路谭家坊火车站，有一个敌人据点。敌人为了“强化治安”，以华治

华，强迫铁路沿线的青年学生，进行轮流军训。每期两三个月，地点就设在谭家坊车站小学。伪区公所分配给我村一个名额，村长就点名叫我去。我接到通知后，随即找到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与他商量去还是不去。林芳圃同志非常肯定地说：“你去吧！谭家坊小学里有我们的同志，你去后，我给你接上关系”。于是，我就答应村长接受军训。

那是在 1939 年的六七月份，我们这些从铁路沿线，益都八、九、十区调来的 100 多位青年学生，专门组织了一个集训队。九区伪区长派他的侄子任队长。我们的军训教官原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被鬼子俘虏后，投降了敌人，日寇还在他的脸上刻上了他的名字。这个谭家坊小学，既有初小班，也有高小班，共有十多个教师。九区区委书记刘迈千同志，就在这所学校当教师，还有一位姓赵的教师也是地下共

产党员。

这个集训。除了每天上午、下午的列队、走步、跑步等军事训练外，还有文化课，学日语，有一位私塾先生上论语课，这样学习了两个多月。学习期间，在谭家坊小学，我曾接待过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和益寿县青救会长赵国栋同志。受训期间，在同学中我发展了两个共产党员和四个青救会员。集训回来后，我任区委宣传科长，从此我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起来了。

1940 年春，我被调往益寿县委宣传部工作。益寿县委在胶济铁路以北，辖区包括益都县的六、七、八、九区和寿光县的五区。当时，益寿县的抗日根据地，主要就是以阳河为中心，东西南北 20 多里地的范围，包括寿五区的大部分及益都七区北部的几个村庄。其他益都六、八、九区及益都七区，大部分都是敌占区和小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游击区。当时，中共益寿县委机关和益北行署（即县政府）及各抗日群众团体机关，就是在这块方圆 20 多里的根据地公开活动。在这个活动范围内，县机关驻地也很不固定，今天住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顶多在一个村住两三天就得换一个地方。当时，益寿县委书记是牟潜修同志（即韩洪甫，后调清西地委任组织部长，杨世宝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是张鲁泉同志，我和赵子美为宣传干事。宣传部就是我们三个人。另外，在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有一个由彭飞同志领导的七八个青年人组成的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时，自编自演些活报剧，并教唱抗日歌曲。益寿县的其他领导同志有组织部长刘旭东（孙诺夫）、干事郭华、郭民两兄弟（后来在敌人对四边地区的大扫荡时都牺牲了），益北行署主任李有典（兼）、副主任赵治安，行署有民政、财政、教育、

武装等科，教育科长孙陶村（后来叛变投降了徐振中），县各救会主任李明村，农救会长王宗东，青救会长杜之唐、赵国栋，妇救会长冀君五，工会主任郝晋卿、赵志和。六大队（即县大队）队长李有典，副大队长赵华川等。县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驻益寿县办事处。县委机关一般都和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住在一起，合用一个伙食单位。工作上互相配合，独立工作。县委机关除了组织部、宣传部和一个秘书处外，还有一个武装警卫班，除了警卫机关外，有时还单独行动，抓捕敌探汉奸。

我从益八区调县委工作后，二府庄子王德贵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王德贵同志是我大舅妈的亲侄子，后来王德贵同志被投降派汉奸王凯臣抓住杀害了，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高家庄集市的树上示众，

情景惨不忍睹。当天晚上，王德贵同志的头颅由他家的人偷偷地抱回了家。解放后，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这件事。我舅妈告诉我：“满头都是血糊糊的，是我亲自洗干净了他的头颅”。

解放后我了解到，当年在益都县八区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和我经常联系的地下党员，除了因工作轮换调离该区工作的林芳圃、张桂一等同志外，凡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绝大多数都被敌人杀害了，还有的自动脱离了党组织，逃到外地投亲靠友去了。如二府庄子的王美琛、李家集李信古都跑到天津去了。薛家庄子的王瞎子（七七事变前的老党员）被汉奸徐振中抓去杀了，尸首都没有找回来。我直接联系的黄家庄地下党员黄盈，连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都被敌人杀害了。另外，我知道的九区组织委员刘凤五，早在 1940 年就牺牲了。南张楼村有一个八区与县委联系的

秘密交通站，联络员是一个单身老汉。1940年春，我从八区调往县委，就是他直接送我到县委机关的。我到县委工作后不久，就听说这个地下交通站被破坏，这个老汉被徐振中抓去杀害了。

我村大袁家庄在胶济铁路以北十几里，处于敌占区长达十年之久，我的亲人被称为八路家属，时常遭受敌人的威胁和恐吓。凶残的敌人对八路家属进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我的入党介绍人杨效先同志的二哥杨宗学也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并关进监狱。我家的亲戚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上门了。我的大哥被迫东躲西藏，长期在外地不敢回家。家中全靠我大嫂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照顾着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有一次，汉奸对我家进行敲诈，指名要八路家属送粮，我大嫂被迫一个人背着大半口袋粮食，徒步十几里路，送到沙店子的敌据点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8 年日本鬼子占领了胶济铁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这里，直到 1948 年潍坊战役后，胶济铁路沿线才得到解放。

二、东朱鹿惨案目睹记

在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初期的山东益寿县东朱鹿惨案的往事，令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我痛心地悼念着当时壮烈牺牲的同志们。我是惨案的幸存者，我有责任将惨案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1941 年 1 月 5 日（也就是 1940 年腊月初八），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勾鼻子等 300 多人包围了益寿县东朱鹿村，驻在此村的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 12 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

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

1939 年，在国民党掀起的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益都县国民党投降派保安团团长徐振中投降了日军，与朱良村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抗日家属。并经常勾结日军，对益寿县寿五区，阳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当时，益寿县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寿五区阳河两岸东西南北不到 20 里的地方，主要是寿五区和益都七区北部一带，这是益寿县委和益北专署（即县政府）和县大队（亦称六大队）的经常驻地和活动的地区。益寿县的其它地区，都是敌占区和游击区。

东朱鹿村，地处益都七区北部，与朱良日本鬼子的据点东西相望，相隔仅三华里，东、西、南面均为敌占区。但是，由于这个村在七七事变之前，就有地下共产

党组织，七七事变后，在战前老党员陈铭新、陈凤九、王宗东、尹斐然等同志的活动和影响下，全村 200 多户村民在抗日战争时，脱产抗日的就多达 144 人。很大一部分先进分子，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队等，已普遍活跃起来。很多青年积极参加了抗日武装，如陈景三、陈乙斋等同志，当时已成为抗日武装的重要负责干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为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东朱鹿村就成为抗日活动、隐蔽活动的可靠根据地。每次遇到有敌人“扫荡”，县委等机关和有些同志，就秘密地转移潜入该村。大家把东朱鹿村戏称为“小莫斯科”。

1941 年 1 月 4 日上午，我们益寿县委在寿五区八户村开会。得到敌人要“扫荡”寿五区阳河一带根据地的情报。当天

下午，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人员就分散了，各自找自己所熟悉的地方隐蔽起来。当时，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同志正在我县视察工作。县委宣传部部长张鲁泉、我和赵子美、李寿岭同志及他的警卫员小罗、刘旭东、还有县警卫班的李新斋、陈铭新等一共八九个同志，由县委秘书陈诚一同志带领，傍晚顺着阳河两岸，秘密潜入了东朱鹿村。

陈诚一同志就是东朱鹿人，他把我们直接带到了他的家里。接着，就安排人去找备有地窝的人家和能够藏身隐蔽的地方。当时，所谓的地窝，就是该村里的地下党员和群众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自己秘密挖的一些洞穴。不多时，找地窝的人回来，将情况作了汇报。陈诚一同志说，这家人的地窝比较小，我们全部去住不下，让我和赵子美另找一个地方躲藏。刘旭东、张鲁泉、李寿岭等同志，就住在了陈

凤吉同志家。我和赵子美同志，由一个同志领着到了青年妇女纪桂英家。当时，纪桂英是妇救会的成员，她家里并没有地窝。当然地窝是绝对保密的，如果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地窝就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住下后也不便问家里的地窝在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除了我们县委的八九个同志潜入该村外，还有区县各救会群众团体的部分同志，六大队和区中队的部分同志，也住在这个村里，加上几天前刚刚搬来的秘密兵工厂的 20 多人，共有几十人住在这个村里。大部分都是秘密进来的，相互没有联系。这天晚上，由于县委的领导驻在该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庆祥同志，亲自在自卫团基干班值班。当基干班的巡逻同志拂晓发现敌人时，村子已被包围了。巡逻的同志马上分头通知各部迅速躲入地窝，兵工厂的 20 多名同志住在王长

荣家里。他家里原本有一个地窝，但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又挖了一个新地窝。王长荣先把同志们送入新的地窝和王怀五家的地窝，自己一家人下了旧地窝。

1941 年 1 月 5 日的拂晓（也就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徐振中汉奸队，带着朱良据点的日本鬼子扑进村子。由于内奸报告，首先就到王长荣家去抓捕兵工厂的同志。敌人堵住了他家旧地窝的入口，威胁他全家人，如果不出来就往地窝里扔手榴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从地窝里出来。敌人对他们全家进行了毒打拷问，威逼他们说出兵工厂同志的藏身处。他们一口咬定“他们前晚就出村转移了，不知到哪里去了”。敌人疯狂地挖刨打砸，翻箱倒柜，但什么也没找到。敌人又抓来陈景堂烈士的父亲陈福开以及群众尹殿昌、尹殿富进行严刑拷打，敌人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敌人就用二齿勾子，

把陈福开大爷活活打死，并把王长荣的房子烧掉。就是这样，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兵工厂的 20 多名同志。

此时，我和赵子美同志还在熟睡中。突然，纪桂英同志急切地敲我们的房门，“同志,快起来,敌人包围了!”我们起来后就听到敌人到处打枪的声音。纪桂英焦急地说：“我家没有地窝，对门陈之正家有个地窝，你们赶快躲到他家去吧”。我俩急切地敲开了陈之正大爷家的门，要求他把我俩藏起来。已吓坏的大爷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被迫回来找纪桂英同志，纪桂英说：“马上再去找他，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们再次敲开了他家的门，陈之正家的大娘眼见已火烧眉毛了，就让我们带上她八岁的儿子“天赐”（乳名）赶紧下了地窝，他们一家只好呆在屋内。这家的地窝很小，我们三人，就已经非常拥挤。地窝的入口，设在他家喂牲口的棚

子里，洞口就在驴槽下，地窝的通风口，设在他家院子里的粮食囤底下。这个地窝就是离地面 1 米多深，宽不到 1 米，长 4．5 米的一条地沟。洞里没有灯，黑洞洞的，我们三人就这样闷在里面。过了很久，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那滋味确实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们将盖洞口的板子掀起一条缝，想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刚掀起一条细缝，就听到敌人在院子里恶狠狠地对陈大娘喊：“你家藏着八路没有，快把八路交出来！”接着，就听到敌人在陈大娘屋里掀桌子、砸碗、翻箱倒柜的声音。敌人又在院子里折腾了一阵子，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就到别家搜去了。我和赵子美同志，就是在陈之正大娘的掩护下，靠他家的小地窝，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死里逃生的。

汉奸杨勾鼻子，在陈凤吉家里找到了刘旭东、张鲁泉、李寿岭等同志隐藏的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